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通典

(上部)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

[法] 格鲁贤 编著
张放 张丹彤 译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大象出版社



中国通典

(上部)



[法] 格鲁贤 编著
张 放 张丹彤 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典：全2册 / (法) 格鲁贤编著；张放，张丹彤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2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347-9757-6

I. ①中… II. ①格… ②张… ③张… III. ①中国历史 IV. 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3993 号

中国通典(全2册)

ZHONGGUO TONGDIAN

[法]格鲁贤 编著

张放 张丹彤 译

出版人 王刘纯
策划人 张前进
项目统筹 李光洁
责任编辑 李爽
责任校对 毛路 安德华 张迎娟 牛志远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27号 邮政编码450016)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5.5

字 数 758千字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8.00元(全2册)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洛阳市高新区丰华路三号

邮政编码 471003

电话 0379-64606268

根据法国国王特许 1787 年新版译出

※

巴黎 马图兰街 克鲁尼大厦

皇后印制-销售书店

出版者告读者书



本书首版之成功及售出之迅速促使我们决定以更宜于读者使用的八开本形式发行第二版。尽管部分出版内容分别以四开本形式和特殊书名拆版发行,但我们必须告知读者:本书构成《中国通史》^①之第十三卷或末卷,并通告拥有这大部头通史的读者如果想补足他们的藏本,请及早补进这第十三卷内容,因为不久后,鉴于限期,我们将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修道院院长格鲁贤(Abbé Grosier)先生首先要驳斥索诺拉(Sonnerat)先生在讲述其最近一次印度之旅时对中国人的尖刻讽刺。但是,众多的旅行家和有识之士已公开抗议,向他指出:今后对他的任何驳斥皆无必要,特别是因为索诺拉先生的全部指控只不过是著名作家鲍先生(M. Paw)^②对中国人的恣意指控的一种重复而已。为了说明索诺拉先生汲取素材来源是多么有悖于事实,我们将满足于在这里转载格鲁贤修道院院长先生于 1776 年对《关于埃及人和中国人的哲学研究》一书的评论。这里(《中国通史》简介)该是消除某些偏激作家对中华民族负面描述影响的合适地方。在这些诽谤

① 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a):《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译注

② 科尔内耶·迪保尔·鲍(Paw, Corneille de Pauw, 1739—1799), 荷兰 Xanten (今属德国) 天主教堂司铎、学者和哲学家, 曾著书《关于埃及人和中国人的哲学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Égyptiens et les Chinois*, London: Lausanne and Geneva, 1774)。——译注

作家群中绝无仅有的如鲍姓德意志博士,亦即《关于埃及人和中国人的哲学研究》的作者以如此刻薄和挖苦、如此大胆、如此缺乏诚意的言辞发泄其对中华民族的鄙夷。这位作家在他的书的每一页里都充满了对亚洲人的最下流的诽谤。他以可憎的色彩描绘他们,把他们说成是宇宙间最卑微、最怯懦、最无知、最腐败、最狡诈的民族。简言之,他把他们说成是世界各民族的渣滓。在他的眼里,这些亚洲人的历史——尽管他从未读过,而且他也不可能读过——只不过是胡编乱造的谎言和荒诞故事;他们的人口极端众多只不过是一种幻影而已;他们的城市稀少而且微不足道;他们的土地陷于荒芜;他们的哲学家中最为圣贤者,诸如孔子、孟子(Mencius),只不过是平庸的教育家而已,他们甚至不懂关于道德的最基本元素;他们没有做过现在欧洲人赋予他们的任何发现;他们的愚蠢头脑使他们无缘于各种工艺。至于立法,他们仍处于童年的愚钝,而他们的政府虽然 3000 多年不变,也仅是一种耗尽钱财的体制,一种非理性、野蛮、矛盾重重的“杰作”而已,如此等等。简而言之,这就是安静地坐在柏林的办公室里的鲍先生对一个他从未见过的、远居于离他 6000 古法里^①之外的民族进行大胆论断的概述。如果鲍先生至少肯告知他的读者根据什么权威部门形成其个人观点,人们也许会原谅他下断言时表现出的那种威严而决断的语气。但是,不幸的是,他属于那种有过广泛阅读,却对知识消化不良,而且忘记知识来源的作家。鲍先生很少有援引,或援引错误:他固执地走在一条充满悖论的路上。如果他沿着自己的系统思路走下去,则必毫无权威可言。他靠计算概率和需求概况来证明,事物必须根据他的安排而存在。我可以从他的书里找出大量毫无根据提出的、只有鲍先生个人学问和诚信做担保的主观臆断。我只略举一二例,便可使读者了解这位德意志博士的粗鄙无知和有意传播的不实之词。像鲍先生这样的评论家理应是坚守诚信的。他在自己的书里,多处正式声言,他拒绝法国耶稣会士们以及其他在中国居住过的传教士们的佐证材料,他公然称他们是伪君子、骗子、热心的谎言家,他们的作品只是为了欺骗欧洲人。

^① 1 古法里约合 4 公里。——译注

然而,当这些传教士的讲述与鲍先生看法一致时,这位作家就把他们当作担保人看待,并且,可以说,乐意以他们的权威粉饰自己。因此,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援引金尼阁(Trigault)、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龚当信(Cyr Contancin, 1670—1733)、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等神甫以及《耶稣会士书简》的作者们。但是,如果这些修道士只是讲述谎言者,为什么他还要求助于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威望呢?如果他们的威望——当其能够证实鲍先生观点之时——理应得到认可,为什么当他攻击和反对这些观点时,又说修道士们的威望不重要、毫无价值了呢?我可以举出同样多的例子,当作者谈到《中国通史》时,在一处他称其为“虚构的编年史”,而在另一处,当他需要借用某些事实支持自己的观点时,他援引《中国通史》时,又称其为“是非常真实的”。

鲍先生不是一位“真诚的作家”,因为他为了为己所用而歪曲事实。我现在试举几例:“中国人的野蛮,他说,似乎有久远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122年;据说,当时有一位名叫武王(Vou-vang)的征服者率领两三千人占领了中国。在那里,他立法,并且尽力使仍倾向过流动生活的居民定居下来,因为这些居民经常迁移他们的市镇,后者只是由可携带的窝棚和帐篷组合起来的。”鲍先生在这里描写的武王既不是冒险家,也不是游民的头领,他是周的君主,应举国诸侯热切的恳求,执行至高权力,进军讨伐商朝(Chang)末代昏君纣王。纣王率大军迎敌。但是当战斗信号打响,他便发现自己被其大军抛弃:他的军队大部分都放下武器,跑着会聚到武王旗下。武王响应全族人的普遍愿望当日安然登上宝座。武王在其统治期内重整法规,恢复前任国王废除的良好习俗,设立监狱,为多家望族恢复名誉与职责,建立新的公国,并委任其亲属职务。在如此真实的中华历史讲述中,有什么能使我们相信中国人直到公元前1122年仍是一个游荡的野蛮民族呢?从这样的讲述中能看到一个陌生的征服者率领一小撮士兵来强力占领了中国,使之开化并且“尽力使仍倾向过流动生活的居民定居下来”?鲍先生从哪里读到过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迁移他们的市镇,他们还居住在可以携带的窝棚里和帐

篷下面？他总是这样主观地论断，从无令人信服证明。

鲍先生以其怪论的大胆和新奇而著名：在他的书里，声称中国人口分布非常不规律，有辽阔的荒野、戈壁、荒僻之地，在各省份内部几乎见不到任何耕作痕迹，总之，这个帝国的一半土地尚未开发。下面是他提到的几个例子：“人们可以，他说，通过康熙(Kang-hi)皇帝广大的狩猎场所的描写就可以对上述问题得出相当准确看法：康熙皇帝于1721年同俄罗斯大使一起狩猎，这个硕大的狩猎场离北京只有两三古法里远，人们难以想象有什么比这里更为荒凉的了——我们骑马行走已经6个小时了，安特莫尼先生(M. Antermony)说，虽然我们已经走了15英里的路，我们仍然看不见森林的尽头。我们转向南边，我们到达了一片沼泽地，有高高的芦苇覆盖着，我们从中赶出了许多头野猪。”很有趣的是，鲍先生在这一段里加入了北直隶省少有作物的状况。这片荒僻的地方，这片庞大的森林正是禁猎区，是皇帝的别墅，距离北京有几古法里之遥。把堂堂帝国的皇帝休闲娱乐的场所歪曲成一片不毛之地，荒芜、被遗弃、没有作物生长的地方，这难道不是作者欲强使公众轻信，并且以此自寻开心吗？我是不是也可以以同样方式来证明法国本身也还是一个没有开化的国度呢？因为我们可以说，在法国首都的大门外就有圣热尔曼、枫丹白露、贡比涅公园，它们也都是拥有庞大的森林、广阔的荒野呀。

鲍先生为了支持他关于中国土地少有作物的这个怪论，还篡改了康熙于1662年尚未成年之时颁布诏书的动机。“鞑靼征服者，他说，一到中国就发现由于中国乡镇有的人口过多，有的人口不足，还有的根本无人居住这样的差异所产生的麻烦不可计数。就此，为了根除这些麻烦，他们做了两件令人惊愕的事情：他们首先禁止海上贸易，而后他们在六个省份里拆毁了近海3古法里的民房，强迫各个家庭退居到内地。”鲍先生在这里援引的事件是确有其事，但是政府颁布此诏书的本意却被他完全给篡改了：政府诏书的本意是让沿海居民退居到不缺人口的内地，因为著名的“叛贼”首领郑成功的船只控制了中国海域，使海上贸易不能安全进行。任何历史学者都能证明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通过让海滨住民退居内地，火烧海岸，截断“叛军”粮草，达

到削弱敌人的可怕力量之目的。一旦“叛军”就范,北京政府就允许被分散的家庭会聚海滨,回到他们原来的住处,这一事实证明政府没有别的意图。有了这样的说明之后,这位鲍博士称鞑靼人为了均衡中国不同乡镇的人口,其政治目的该是什么呢?

鲍先生信手拈来,进行诋毁性的责难。我的驳斥定会引起一切正直而公正的人们的愤怒。这位作家想要欧洲人相信中国人属于迷信又野蛮的民族,他们有向坟墓上泼洒活人血的习惯。据他说,以奴隶做牺牲品至今仍是中国人葬礼要遵守的一种仪式。“这种习俗,”他说,“直到今日仍存在于中国,我们非常怀疑这种习俗是否已被废除。在这方面,我们产生巨大而忧心的怀疑,因为法国耶稣会士们说,康熙皇帝已经立法^①,规定皇家亲王逝世时禁止以奴隶做牺牲品。而在这所谓的立法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康熙皇帝亲兄弟 Ta-vang 亲王的葬礼上,人们当场勒死了一些女人。这次处死是很近的事,当前在北京还活着的人可以证明。”

确实,康熙皇帝颁布了鲍先生在这里提到的这个法律。但是,康熙皇帝是在什么时机、什么场合颁布此法的呢?仅此事实就会告知人们,这位作家是以怎样大无畏的冷静滥用他编造的事实的。颁布此法的时机是这样的:顺治是占领中国的满族征服者的第一个皇帝,他疯狂热爱的妻子于 1660 年猝死,他痛不欲生,为死去的皇后恢复了鞑靼人施行的在名人葬礼上泼洒活人血的可憎习俗。当时三十多个奴隶成了牺牲品。这样野蛮地处死奴隶激起所有中国人的愤怒,中国人的葬礼习俗要文明得多,绝无这种血腥的仪式。汉人的强烈愤怒公开而普遍,致使刚登基不久的康熙皇帝颁布法规,此后禁止施行这样的牺牲。鲍先生不会不知这一事实,怎么能无理地把只属于鞑靼人的习俗——征服者从他们的文化里带来的习俗,在汉族人中从未发生过的、遭到普遍憎恶的习俗归咎到汉族人头上呢?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怎么敢援引反对这一习俗的法规呢?因为这个法规存在的本身就正

^①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明令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以下的奴仆随主殉葬,从而结束了清初的皇室人殉习俗。——译注

是中国人反感宰杀活人做牺牲品的鲜明证据。

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康熙皇帝有个名叫 Ta-vang 的兄弟,很可能作者想说的是台湾岛亲王——康熙的军队已于 1682 年征服的叛逆汉人。我不知道这位大人的葬礼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最大的可能是鲍先生讲述的是捏造出来的,因为如果当这位作家援引事实做证据时都是不可信的,更何况,当他为了担保自己的观点,只是引用诸如“当前在北京还活着的人”如此模糊的旁证和不靠谱的权威,他还能更可信吗?何况,我们了解 1730 年当时皇帝的叔叔葬礼仪式的细节。给这位皇叔的荣誉超出了一般礼仪范围,但是人们没有发现任何与鲍先生描述的恐怖情况的相像之处。他归咎中国人的这种习俗甚至在中国人最久远的君主政体时代都找不到根据。可以读一读《书经》(Chou king)^①第四部分的第 22 段,书中讲到中国古代国王葬礼施行的习俗。鲍先生对中国人的偏见并不高明,他过于偏执,过于高调,过于缺乏审慎。作者想给其一系列诋毁性谎言蒙上真理的色彩,如果他能够不时地掩盖一下他的偏执,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十分必要的这种有节制的差异,他本来也会具有吸引力的。例如,当他说,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中,如果发现有什么英勇行为和英雄主义表现,“这都是鸦片效应使然”,人们能相信他的话吗?他能让谁相信,一个有 4000 多年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的个体人,他们的头脑和感官不受到一种麻醉剂烟雾的兴奋作用,就不会产生英雄行为呢?

我随意打开鲍先生的书,就发现了一个另类的错误。他肯定地说,汉人和鞑靼人一样,都曾是游牧或游动的民族。并且,由此他归纳出他们的住房样子,他断言,帐篷就是他们住房的模式。他补充道:“当人们观察一座汉人城市时,就会发现它仅仅是一片居住营地而已。因此,我发现,当德布甘维尔先生(M. de Bougainville)谈到在巴达维亚(Batavia)^②附近的汉人居住区时,他总是把汉人的居住区称作‘汉人营地’。”只要看一看这个命名的来源,

① 《书经》即《尚书》,后文不再注释。——译注

② 巴达维亚是今雅加达旧称。——译注

就可以知道这个命名是不能看作是鲍先生观点的证据的。当荷兰人到达爪哇时,他们在那里建筑了营房,并且加固了防御工事,他们起始称这些营房为“荷兰人营房”。这个荷兰商人聚居地的称谓在巴达维亚的后续活动中被沿用下来。后来,中国人来了,占据了同一个地方,并且在那里建设了城市,沿袭了原地的称谓法,称之为“汉人营地”。如果法国人或英国人继承了荷兰公司来到这里,这同一个地方本也可以称作“法国人营地”或“英国人营地”的。仅从这个命名就下结论说,我们的城市或英国人的城市仅是“一片居住营地”难道不是非常可笑吗?

无须对《关于埃及人及中国人的哲学研究》一书再做更多的批评意见了。我只略举上述几个例子,公之于众,便可以让读者明白鲍先生的著作不可信,它只是被事实粉碎的一堆令人作呕的谎言、诽谤性的指控、信手拈来的奇谈怪论而已。

译者序



一、来华法国耶稣会士概况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它于1534年由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ce de Loyola)在巴黎创建,其会规于1540年得到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的批准和认可,1773年被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取缔,1814年又被教皇庇护七世予以恢复。耶稣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即来华耶稣会士)人数多,势力大。他们主要来自葡萄牙、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意志、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等国。他们身兼传教和收集中国各方面情报的双重职责。17世纪中叶后,法国称雄欧洲,内外政策强势拓展。“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时期是“耶稣会士来华的黄金时代”的开端,“国王的数学家们”参与了皇家科学院研究计划,并作为国王和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J-D Cassini, 1625—1712)的密使被派往中国。1700年1月7日,为了庆祝新世纪的到来,路易十四穿着中国式服装,坐着八抬大轿出现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舞会上,令举国上下震撼不已,这助推了欧洲“中国热”。在中国,康熙皇帝自幼钦佩传教士们的科学素养,他于1693年7月决定委派白晋

(Joachim Bouvet, 1656—1730)神甫为其特使,返回欧洲去招募更多的有学之士来华相助。1697年4月初,法国国王接见康熙皇帝特使白晋神甫,随后决定组建新的传教团前往中国。由此,法国在华的传教团队伍扩大,越来越多有学识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在华的法国耶稣会士都学有专长,其中不乏掌握当时顶级知识和技术的学者和专家。总体而言,法国耶稣会士的素养比之同期来华的其他国家传教士水平要高。他们在传教和力图以基督教归化中国的过程中,把有关欧洲先进科学技术的书籍介绍到中国,并在中国从事大量天文观测、地理考察、地图测绘,以及数学美术、建筑工艺、医学医药、宗教哲学、语言文化、哲学文史等诸方面的考察研究。他们勤于学习,精于研究,其中佼佼者谙熟汉语,甚至满语和鞑靼语,熟读中国典籍,能用中文和西文著书立说。他们秉承利玛窦神甫的经验,为利于在华传教,他们入乡随俗,取汉名,说汉语,着汉服。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国,与中国各界人士都有密切接触,从皇宫内院到各省区县镇,从在皇帝身边服务到广交官署和庶民。16世纪以来,将近二百年时间里,他们通过大量的书信、报告、回忆录等著述,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古老文明,如民情民俗、工艺物产等,成了欧洲人认识和了解中国的窗口。当时在法国先后出版了三部经典巨著:《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和《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eking*)。这奠定了法国成为欧洲汉学研究中心的地位,且远早于其他国家。在明末清初的中外关系中,法国耶稣会士扮演着重要角色,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主力军。他们收集的大批有关中国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名人逸事、宫廷秘闻、重臣辅政等各方面资料,在中国正史典籍中大都不可见,成为今天研究明清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源。

二、格鲁贤及《中国通典》

本书作者格鲁贤(Jean-Baptiste Gabriel Alexandre Grosier, 1743—1823),

于1761年进入耶稣会,一生都从事文学和艺术评论,曾任卢浮宫圣-路易教堂(église Saint-Louis-du-Louvre,随着卢浮宫的扩建,此教堂于1811年被拆除)议事司铎,1810年出任军火库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 Arsenal,地名来源于前军火库驻地)助理,1817年升为馆长。

格鲁贤多年研究中国哲学、历史、美术、文学。他不仅介绍了《诗经》,还在《世界传记》上发表《孔子传》,于1776年负责出版了由在华传教士撰写的《中国杂纂》,于1783年,与德奥特莱(Deshauterayes, 1724—1795)合作出版了冯秉正的《中国通史》后,又对之进行改写,使其具有现代形式。

他虽然一生从未踏足中国,却是继杜赫德之后,又一位对中国以百科全书式的描述,而对法国汉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早期汉学家。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杜氏逝世之年正是格氏出生之年。杜氏于1735年发表的《中华帝国全志》率先以独一无二的全景式视角向欧洲人推介有关中国的百科知识;50年后,格氏于1785年发表的《中国通典》(*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是其于1777—1784年间相继发表十二卷本冯秉正《中国通史》(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 *L'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的补充卷,亦即第十三卷,完全由他本人撰写。在这一卷中,格鲁贤既传承了杜赫德作品的内容,使之于50年后得以重新现实化,又有其个人创新:根据一个特殊的目录,他重新组合提炼了前人的成果,并且刻意收进了自1776年以来,在亨利·贝尔坦(Henri Léonard Jean Baptiste Bertin, 1720—1792)内阁部长支持下出版的由当时仍停留在北京的最后一批耶稣会士撰写的《中国杂纂》这样最新到达欧洲的知识。

《中国通典》分上、下部,上部讲述构成中华帝国十五省、鞑靼地区、从属国、岛屿的地理地貌、主要城市、人口民族、水陆交通、地方物产、自然历史、动植物、中医药材等。下部讲述最新到达欧洲的有关中国的新知识,内容涉及中国政府、统治权力、文武官员、武装力量、军队纪律、法律、城市治安、宗教习俗、语言文学、经济生活、科学技术等。

《中国通典》1785年首版获得极大成功,同一年再版,并被译成英文和意

大利文,随后多次单独发行,分别于1785年、1787年和1818—1820年间,有过三个独立法文本;1788年和1789年分别在伦敦和莱比锡推出英译本和德译本,英译本又于1895年再版。由此,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格鲁贤的《中国通典》可称作法国18世纪向欧洲推介中国的姊妹篇,在西方汉学领域产生了日月同辉的影响。在法国,它们不仅为法国汉学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广泛的题材、富饶的土壤、无限的思考和多彩的远景,而且在伏尔泰称之为“难以满足企求了解中国的渴望”的18世纪,也可以说它们在催生启蒙精神形成和促使旧制度崩溃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它们为法国非传教士汉学家以及后来雷慕莎(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在法兰西科学院开始汉语专业讲座铺平了道路。

《中国通典》何以首版后当年再版,而后又连续再版,而且被译成多国文字连续再版?笔者以为主要原因如下:

(一)历史时代的召唤

耶稣会士受欧洲列强、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派遣来华布道,传播福音,他们利用中国皇帝的开放和包容,潜心从上层做起,力图归化中国。他们把欧洲的科学技术、书籍、仪器介绍到中国来,并根据各自的任务和专长在中国从事大量的天文观测和地图测绘,在美术、数学、建筑、文学、医学、史学、生物学、语言音韵学诸方面做了考察和研究,同时,也介绍了中国的古老历史和文明。正是根据在华耶稣会士长期不间断的报道,以及在华耶稣会士和在欧洲的耶稣会士之间的交流活动,在法国先后出版了多卷本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杂纂》,由此助长了17和18世纪的“中国热”浪潮。诚如伏尔泰所言,欧洲到处有“企求了解中国的渴望”,他本人根据耶稣会士提供的资料,编写并亲自导演了《中国孤儿》,为“中国热”推波助澜。格鲁贤在准备发表冯秉正《中国通史》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发表的中国史大全正是欧洲各国文献中所缺乏的”,此前,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只限于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神甫的拉丁文简史介绍,时间截止于基督诞生,而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关于中国史的介绍只是

将卫匡国的拉丁文小册子翻译成法文,不能满足人们的期待。格鲁贤强调冯秉正的《中国通史》为欧洲学者提供了关于中国历史的最为全面、真实而有趣的知识。之后的《中国通典》实乃正当其时的作品,适应了历史氛围的需要和人们的渴望。

(二) 耶稣会传教士的魅力

诚如,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在《路易十四 1685 年派往中国的数学家》(见《国际汉学》2016 春之卷,第 26~48 页)一文中,指出洪若翰、白晋、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李明、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等都是耶稣会中顶级的专家、学者,作为国王和天文台台长卡西尼的密使利用到中国传教的机会肩负着开展科考,进行天文地理测量、测验的任务,并于赴华前被任命为自然科学院通讯院士,他们构成了法国耶稣会驻华使团的核心人物,即便其他入华的耶稣会士也非等闲之辈,他们都是掌握当时欧洲最新知识的,至少都有一技之长的科学家、语言学家或艺术家。他们同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各个学者、学院保持联系。他们生活于北京和宫廷之中,有的甚至在宫廷中任职,或出任中国皇帝的西学老师,更多的人分散在中国城乡,收集大量的有关中国风土人情、历史地理、内政外交、社会经济、民族宗教、文化习俗、手工艺绝活、军事战争、科学技术、名人逸事、宫中秘闻等各方面资料。他们的调研、考察、讲述和通讯报道自然更具有科学性、真实性、趣味性。

(三) “欧洲中心论”受到冲击后的反弹效应

由传教士开始的东学西进,引起欧洲固有的欧洲中心论者的错愕、惊异、质疑,甚至引起激进中心论者的不满、嫉妒,乃至转化为仇视。格鲁贤于 1776 年出版冯秉正《中国通史》和 1787 年出版《中国通典》时,两次援引德意志作家鲍博士,亦即《关于埃及人和中国人的哲学研究》的作者所说的话——“以如此刻薄和挖苦、如此大胆、如此缺乏诚意的言辞发泄其对中华民族的鄙夷。这位作家在他的书的每一页里都充满了对亚洲人的最下流的诽谤。他以可憎的色彩描绘他们,把他们说成是宇宙间最卑微、最怯懦、最

无知、最腐败、最狡诈的民族”。继而，把做真实报道的耶稣会士说成是骗子、谎言家。其实，这就是 18 世纪“中国热”中某些人发出的不同声音。由于嫉妒和无知，他们甚至不相信当中国唐代开明盛世之时，欧洲尚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他们不相信康乾时代中国人口能有二亿多，更不相信中国的天文学，测量日、月食远早于欧洲，等等。但是，传教士们的活动和著作对欧洲中心论的正常冲击，引起了欧洲人，尤其是欧洲精英们的好奇，使他们渴望了解更多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

（四）《中国通典》的特色

格鲁贤没有到过中国，但他一直负责保持与 27 位在华耶稣会士的紧密联系，以及同相关科学院、图书馆的关系，负责整理、出版汇聚于巴黎的耶稣会士的工作成果和作品。他对有关中国的材料能够做到高屋建瓴、纵横捭阖地利用，集中国知识之大成。他的《中国通典》是对《中华帝国全志》的提炼和创新，突出表现格鲁贤的独立思想、独立观点，他注意依据中国人的材料和经过考证的文献资料，反对与驳斥某些偏激作家恣意鄙夷中国和中国人的谎言与不实之词。他在 1787 年版增加的《出版者告读者书》中明确指出索诺拉（Pierre Sonnerat, 1748—1814, 法国博物学家）和鲍博士之流的谎言和荒诞作为。他的研究似乎倾心于中国文化，他能做到冲破礼仪之争的樊篱，乃至利玛窦小心翼翼的谨慎，竭力说明中国宗教与基督教接近，把中国人的起源追溯到诺亚后的新人类，承认中国人是一个具有 4000 多年古老历史的独立民族，批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中国人起源于埃及人之说，称中国医学始于国家建立之时，赞扬中国有数不胜数的医学用书，“当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自诩有他们如此古老的医学传统”，“即便中国医学家不是解剖家，也不是哲学家，但他们的脉搏学和草药学足以让欧洲行家吃惊”。格鲁贤可谓西方早期少有的承认中医的学者。《中国通典》被誉为“最重要的耶稣会士科学作品”，足见其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